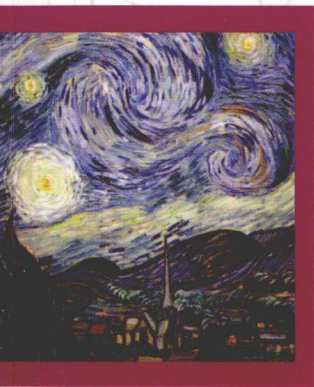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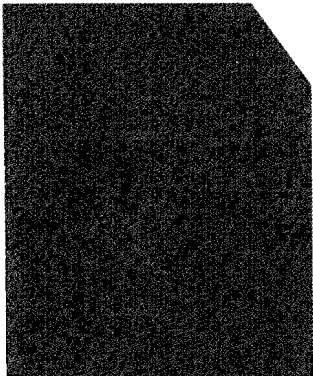
冯黎明◎著

走向全球化

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
传播与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走向全球化

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
传播与影响

冯黎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9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4-7962-8

I. 走… II. 冯…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现代②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当代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144 号

策划编辑 李炳青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任：赵世举 刘礼堂

副主任：尚永亮 陈国恩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献初 王兆鹏 吴天明 张 洁 张荣翼

陈文新 陈国恩 尚永亮 於可训 涂险峰

目 录

引言	(1)
序论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嬗变	(4)
第一章 学术界对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	(42)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陈述	(43)
第二节 审视新时期文论	(52)
第三节 关于现代性西学东渐	(62)
第二章 现代性西学东渐的历史支点	(71)
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的边际化	(73)
第二节 文学性呈现方式的多元化	(79)
第三节 现代性的焦虑	(85)
第四节 文学理论的生存策略	(91)
第五节 近现代西学东渐的基础	(97)
第三章 现代性西学东渐的历史程序	(102)
第一节 “文艺复兴”	(103)
第二节 走出历史理性	(111)

第三节	逃离元叙事	(120)
第四节	消解总体性	(134)
第五节	找寻思想资源	(148)
第四章	现代性西学东渐的逻辑程序	(167)
第一节	人道·审美·心理	(168)
第二节	解放能指	(178)
第三节	意义经验的个人化	(187)
第四节	置换元叙事	(197)
第五章	现代性西学东渐的二难处境	(210)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与自我认同	(213)
第二节	本体论接口与策略性接口的错位	(220)
第三节	源文件的压缩与应用程序的扩张	(226)
附录一	徘徊于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的“文学性”	
概念		(235)
附录二	汉语的文字特征与文学性	(255)
附录三	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问题	(266)
附录四	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自律问题	(276)
附录五	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	(286)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关于文化研究	(327)

引 言

20 世纪晚期的两个 10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在这个被称为“新时期”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其最为显明的变化乃在于文学观念的更新。倘若我们把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当前的文学文本、文学理论文本比较一下，必定会因为其间变化之剧烈而颇感惊异。当初那种肩负着经国大业、言说着社会历史规律的文学，如今已被以个人生命经验为意义枢纽的文学所替代。

文学观念的这种变迁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学模式，那一模式在剧变到来之前曾“霸权化”地统治着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它既非中国古典的诗论、文论，亦非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想话语，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但它似乎兼有这几方面的理解方式和价值原则。它把历史理性、政治教化和生活世界的表象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排斥全部个人生命经验和差异性意义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装配有历史理性的必然性，同时又得到了权力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的支持，因而成为一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从根本上规定着一切文学活动的在场方式。

改革开放意味着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总体化社会运动转向“解总体化”。解总体化允许某种外在力量干预社会系统的构成从而改变这系统的运作方式。系统内部的调整固然可能引起一些缓慢的改良，但外在的差异性力量的介入所引发的变化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的意义。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这种外在的差异性力量就是西方现代文论。当这些凸现代性之“新异原则”（阿多尔诺语）的理论话语一拨又一拨地被译介到汉语世界中，那种建立在同一性思维基础之上的一元论和决定论的文学观念出现了崩塌的迹象。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在张扬意义经验个人化、能指游戏的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下一步步地走向解体。所以，要准确地理解和评价 20 世纪晚期中国的文学观念变革，就必须将其放在全球化视野，即现代性语境中的西学东渐之下来加以考察。从观念转型的层面上看，正如近代史上的那场西学东渐造成了以伦理学本体论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崩溃一样，20 世纪晚期的这场现代性西学东渐，乃是中国文学观念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转型的驱动程序。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理论话语层面上文化身份认同体丧失的挽救，这表现在关于文论话语“失语症”的讨论以及对“汉语批评”的提倡之中；二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这表现在文化研究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冲击之中。这两种倾向似乎暗示着两种新的文学观念。一是对汉语的“返乡”，即，从来自西方话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回归到汉语中蕴涵着的、来自筑居之大地的本真生命经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文学观念则是要让文学摆脱审美的纠

缠，变成一种普遍的意义生产方式，甚至成为一切意义的起点。如果这两种文学观念来到世上，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又有着怎样的未来呢？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梳理过去。也许从对过去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找到几粒埋在历史深处不知何时会发芽的种子。

序 论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嬗变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中流行过两个口号，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口号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努力于将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正确的东西恢复过来。人们普遍相信，像政治上的平反冤假错案一样，让“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路线重归社会生活的主流地位，中国社会便可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场以“恢复”为特征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深入到文学的领域。随着“重放的鲜花”向世人展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开始在先前的武器库中抽出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古老兵器。尽管也有学者试图用近代理性、人道主义修补十七年文学理论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明显缺漏，但 1984 年以前的文学理论，具有统治力量的理论观念仍然是十七年的体系。

今天活跃在国内文艺界的文人，大都是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初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最初形成他们关于文学的理论认识的知识体系，乃是两部足可以称作传统文学观念之总结的教材：其一是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其二是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这两部主要观点类同的著作揭示

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本质、文学意义、文学价值的原则。那时的学者在进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时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基本上与这两部著作的观点一致。而且，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进发历程中文化精神的沉积，它们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俄苏文论、中国古典文论的集合，表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界所秉执的一种整一性观念，或者一种关于文学现象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为人们评判文学的属性、意义、价值等提供了一元论或决定论的支点。

进入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获得了创新发展的历史语境，但又不能不承受一种元叙事的规训。从上述两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元叙事的一般内涵：

1. 关于文学的本体——文学是人们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2. 关于文学的意义——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规律或本质的揭示；

3. 关于文学的价值——文学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化大众的方式；

.....

如果我们把这些一般内涵与最近年代的中国文论比较一下，一定会为二十余年来文学学者观念上的剧变感到非常吃惊。当年我们依据某一“主义”或“标准”讨论文学现象是否合乎某种“成文法”，现在我们讨论文学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心理经验；当年我们要求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真实”，现在我们陈述文学的话语游戏；当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涉及国家社稷的微言大义，现在我们把文学文本视作能指游戏的踪迹；当年

我们认定造成文学风格、文学话语形式的是政治事件、历史运动，现在我们把叙述形式当作个人心理经验的表征……毫无疑问，20多年的历史已经使得中国文学在观念上抛弃了某种先在的元叙事的限制。元叙事的解体，乃是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观念转变的最突出的特征。

进入20世纪晚期，亦即我们常谈及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界所共认的文学观念，乃是近代中国向现代性演进的历史的自然结果。这一文学观念形成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百多年的历史把诸种文明因素注入文学理论界，这些因素包括：现代性启蒙、民族救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政治运动、半殖民地的文化形态、从延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革命文学实践、俄苏文学观念、中国古典文论，等等。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单独承担起构造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力”才能造出那种具有元叙事功能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我们可以称这一话语系统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

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首先一个特征在于，它既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总体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总体性“序化”的表现。王一川在讨论“卡里斯马与兴体”时论述过十七年中社会总体化运动，他认为“试图摧毁‘旧社会’的私人的、个体的生活方式，把一切都变成公共的”这样一种“总体化”运动，与阶级化发生了矛盾，这就促使意识形态去生产那种卡里斯马典型以超越这一矛盾^①。政治经济领域里的体制

^① 王一川：《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5页。

性总体化，作为一种结构化运动转移到文学理论中。总体化既要求全部意识形态形式遵从总体化，也要求意识形态在政治总体化的规定下走向观念的一体化。就像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行政权力的中心化一样，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也力图用统一的原则界定全部文学现象，制造出一种总体化的文论话语系统。在文学活动的基本性质问题上，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引入唯物主义哲学将其设定为“文学是通过作家头脑对社会生活的反映”^①或“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②；在文学文本的意义问题上，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从认识论出发将其定义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形象的认识”^③或者“是反映在作品中的、包含着作家的主观评价的客观现实生活”^④；在文学价值问题上，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将其表述为“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⑤或者“文学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⑥。这样，全部文学活动的内涵就被纳入了一个总体原则的规定之下，形成了关于文学的同一性理论话语。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在总体性文论话语的规训下，文学批评大都是在进行一种“称量”活动，表现为依据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尺度裁判文学现象的是非优劣。其最明显的特征在于集中讨论文本的指涉意义与生活世界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这种关系是否合乎意识形态原则等问题。那一时期文学理论争论的一些问题，诸如“真实性”、

① 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 页。

②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③ 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0 页。

④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95 页。

⑤ 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 页。

⑥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1 页。

“形象思维”、“人道主义”，等等，一方面体现了同一性范式下边缘命题的确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边缘命题对同一性范式的修补。比如“真实性”问题，它既是反映论文论模式的必论之题，同时一些论者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相区分的做法也透露出对直线因果的反映论模式的怀疑。1985年以后，大批全然不同于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西方现代文论涌入中国文学理论，促使学者们走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去找寻异质化的文论话语，当这种异质性的文论话语变成人们普遍使用的武器的时候，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也逐渐趋向解体。

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另一个特征是它鲜明的历史理性。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把文学视作历史的符码，整个文学活动都被内置于历史；不仅文学文本被要求承载历史运演的内涵，而且文学自身的在场形式也受到历史必然性的规定。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文学“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就意味着文学是一种参与政党政治活动的工具，它受着政党的历史性目标的引导。在领袖话语的启示下，文学理论否定了文学性“自我”的存在方式，而将文学严肃地限定在“时代”概念的总辖之下。在《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中，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被加上了“时代”这一历史化的限制词；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只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其主要任务乃是在特定的文学样态和历史运动之间建立起连接通道。更为重要之点在于，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要求文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构造模式进行理解和评价活动。在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论话语系统中，“时代”和“现实”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这里的“时代”

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演进阶段的序化模式所规定的、具有某种必然性内涵的时代；而“现实”则是被政治意识形态置入了预设意义的现实，是显示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①的生活世界。因此，被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所规定的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文学本质，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必然性对文学存在方式的一种主观性规定。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总体化运动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致力于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演进的序化模式的论述，它以历史因果论、历史阶段论和历史目的论将全部人类活动统摄到一个理性的逻辑模型中，同时也赋予了社会主义时代当下生活状态以合理化的依据。作为意识形态总体化的角色之一，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理性的载体。80 年代初，中国文学批评界曾展开过一场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一些论者依据历史理性模式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会出现悲剧，反对者也依据历史理性模式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会出现悲剧，如曾庆元写道：“社会主义的确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与把开辟了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当作到达了理想境界也不同。因为它同时还承认，社会主义同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相比，它又是一个有着很大局限性的社会。”^② 作者论述社会主义时代悲剧的成因时，出发点仍是历史发展阶段论。1985 年以后，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形式主义思潮对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最强烈的冲击，就是用文本自足性和个人化的话语经验将文学性从历史理

① 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载杨柄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5 页。

② 曾庆元：《悲剧论》，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6 页。该书虽然出版于 1987 年，但写作时间是 80 年代初期。

性中剥离出来。只是到了 90 年代，新历史主义又使得中国文学理论返身去寻找历史。但这时寻找的历史，已经全然不同于当初那种总体性的历史了。

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在理论上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诉求，设立元叙事以构建阐释体系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欧洲近代理性的产物。近代理性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俄苏文论向竭力靠近现代性的中国提供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使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在认知形式上适应总体化运动。以构造本质为旨归的元叙事将一种序列化的二元模式推向文学活动，这些二元模式包括：本质/现象、内容/形式、背景/前件，等等。在这些二元模式中，本质、内容、背景等起着规定现象、形式、前件的作用，因此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乃在于对具有规定性功能的本质等作出界说。在元叙事的统治下，文学活动的一切在场特征都被视为最高的预设本质的症候，甚至文学的存在也只是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对文学的理论阐述，往往是基于一个预设原则，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由此推论出显现权力化功能的核心命题，继而用这个核心命题界说文学现象。元叙事的产生是社会生活总体化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个元叙事本身就适应着总体化了的意识形态。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文论话语系统的预设前提，其中心话语就是“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无论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实践中遇到怎样的证伪性现象，元叙事性的中心话语都不可改变，需要做的只是进行一些边缘命题性的修补，比如以“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等进行修补的工作。所以 1985 年以前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争论，常常是在不触动元叙事的前提下进行的修

补方式的争论。比如在涉及与反映生活密切相关的“真实性”问题上，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发明了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区分的说法，以此来修补“反映”与“创造”（或“想象”、“虚构”）之间的裂隙。元叙事的设定对于创建“大一统”性质的文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在元叙事的作用下，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得以建立了一套一元化的文学性鉴别和艺术价值评估的系统。靠着这套系统的应用，我们能够明晰地判断文学现象的高低优劣，而不会落入相对主义的“杂语”或虚无主义的“失语”之中。但是元叙事的预成霸权本身是一种决定论模式的功能显现，因此它粗暴地否定了理论创新和个性化的思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当元叙事获得政治权力的支持时，它会对民主意识和学术自由挥舞起专制的棍子。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持续性地走上了一条逃离元叙事的道路。尤其是大量的西方现代文论涌入后，新奇的体系性文论话语直接冲击着文学理论界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霸权地位；发展到世纪末之时，文学理论论坛上的“杂语喧哗”完全冲掉了那一元叙事存在的基础。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文学理论是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进入 21 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理论的最明显的特征便是文论话语的多元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曹顺庆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症”^①。我理解曹先生并不是要回到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这个理论系统本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曹顺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 年第 3 辑等。